

晚清 ‘国民’ 概念考

A Corpus-based Investigation of *Guomin* in Late Qing China

曹青 Qing Cao

英国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qing.cao@durham.ac.uk

Abstrac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dynasty to a modern nation-state. However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often pushed and guided by a system of ideas. Previous studies on late Qing transformation giv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ideational world of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a corpus-centred empirical stu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evalent notion of *guomin* in late Q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ap and semantic regrouping. It argues that,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as highlighting such values as liberty and individualism, *guomin* prioritises obligations of the people to the state to transfer their loyalty from the family to the newly imagined nation-state. Thus, *guomin* as a newly risen term after the 1895 Jiawu defeat, became an elitist demand for normative behaviours on the part of people as part of China's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article delineates four levels of semantic meanings of *guomin* as a statist construction of a new 'national people'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Qing empire to a modern republic.

Keyword: *guomin*, Chinese nation-state building, corpus linguistics, semantic field, *xinmin congbao*, *minbao*

论文摘要

近代中国发生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便是由“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过渡，然而制度更迭往往由观念的引领与推动，观念由语言构成与传播。以往晚清社会变迁研究侧重于制度的演进，而对思想观念变迁中的语言作用重视不足。本文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以语言建构概念图谱及语义场“语义重组”为视角，考察晚清风靡一时的“国民”概念，讨论传统“天下观”向现代“民族国家观”转变中“国民”一词的概念与历史语义。

本文认为，“国民”作为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强调的理念，并非仅指“个人意识”之觉醒与张扬。恰恰相反，晚清精英对“国民”观的弘扬褒举，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对中国散沙般民众的工具性需求，是由上而下为迅速组成现代国家对大众规范性要求，而弘扬个人解放居次要位置。通过 WordSmith Tools 软件对晚清改良与革命报界大论战语料库中“国民”搭配词语义场的实证考察，本文详析“国民”概念多层级的复合语义构成，梳理“国民”与中国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西学东渐中欧陆概念在中国本土化过程¹。

关键词：国民，晚清，民族国家，语料库，语义场，新民丛报，民报

¹ 本文为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基金会（AHRC）“开放的世界”(OWRI, 2016-2020)所资助的研究项目。

引言：“国民”概念与晚清社会转型

在晚清社会变迁研究中，思想观念的冲突，往往被纳入黑格尔式的历史进步论逻辑框架，在启蒙进步论视角下，丰满的社会生活被嵌入了单向、平面、机械的思考模式，陷入历史目的论的窠臼。在启蒙话语的两极对立思维中，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开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被赋予先验价值判断，忽略了社会生活鲜活、复杂的厚度与本然。本文脱离以往先验价值框架，以语言与社会互动为视角，解析晚清政治文化精英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为促进国家的现代转型服务。讨论以“国民”为例，解析“国民”概念如何以救亡为核心，以“民族国家”建设为宗旨，为中国寻求复兴之路。由于传统中国既无“民族”概念，只有“家族”与“宗族”；秦汉以降“国家”意识日薄，只有“朝廷”与“天下”，“民族国家”建设首先遭遇了语言表达困境。晚清精英只能以新创词语（多由日语传入）表达欧陆“概念图谱”（见下文讨论）。这些根植于欧陆近代观念的词语，通过近代报刊传播，促发晚清社会价值层面的舆论风暴，引发社会变革。“国民”概念兴起构成“民族国家”舆论建设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国民”作为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强调的理念，并非仅指现代个人意识之觉醒，或个人观念的张扬。恰恰相反，晚清对“国民”观褒举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初期政治与文化精英对中国散沙般民众的工具性需求，是由上而下为迅速组成现代国家对大众规范性要求。

“国民”指“一国之民”，“国”指现代之国，而非晚清王朝。其核心涵义是聚一国之民组成现代“民族国家”。由是“国民”与倡导个人主义，弘扬个人解放等个人主权观念的关联，远远低于以一国之民建中华之国的内涵。本文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以语义场理论中的语义重组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晚清报界大论战语料的实证梳理，详析“国民”一词不同层次的语义构成，及其与现代国家建设的互动关系。所用语料取自晚清重要报刊，以1905-1907年间《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与革命大论战主要文章的语料库（以下简称《大论战语库》）为分析案例，通过Wordsmith Tools软件对语料库中“国民”一词的搭配语进行系统语义剖析。除大论战语料，本文使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简称《专业数据库》）对晚清民初与“国民”相关词进行历史纵向走势及相关背景分析，将“国民”一词在大论战（1905-07）中的历史语义截面剖析，与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纵向发展历程结合起来，凸显“国民”概念的立体剖面及深刻的历史意义。

概念图谱与语义场：“国民”话语理论透视

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无论是功能派、结构派，生成派或是认知派，均强调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辨析其关系的结构特征。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77）将文化观念纳入语言与思维讨论中，提出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双系藕动的观念，认为语言与思维内在关联的运作机制以文化为纽带，由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进行的表征活动完成。所谓表征，即“人脑在语言作用下通过概念产生的意义”的过程（Stuart Hall 1977: 17）。霍尔将文化定义为“意义共享”，“意义共享”前提是语言共享，因为意义由概念而生，概念由语言构成，人们须享用共同语言，才能拥有共同概念，进而拥有共同价值。由此，霍尔将语言与思维关系纳入历史的范畴进行动态考察，将语言从“结构”与“生成”机械框架中解脱出来，纳入语言实践中加以剖析，观察其与思维的现实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由语言与概念双重系统叠加而成。即一方面，语言活动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以表征方式认知世界，在表征过程中将语言与概念连接起来，使人类可以思考交流，建构意义。然而所谓“意义”，只产生于人们所指事物与大脑中概念的关系。因而，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概念系统。概念系统的功能是将各种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排序，在概念间建立关系。正是由于概念间特定关系的确立与有序互动，单一概念才产生了意义。换言之，单一概念本身不具备意义，必须与其他概念发生关联才能获得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外界因素的变化，单一概念背后的概念群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因而对单一概念的考察必须是历史与动态的。本文对“国民”观念的梳理便在这一理论关照下展开。

由于语言的意义产生于概念，霍尔认为语言与概念互动发生于“概念图谱”（conceptual map）的运作之中²。因为现实生活中，概念间互动形成概念群，概念群叠加形成“概念图谱”。任何单一概念背后，都存在着不同阶次的概念群落，如一个同心圆，处于圆心的单一概念的意义由不同层面概念群所支撑，每层都构成与圆心概念的一组关系（见图1）。霍尔所言“概念图谱”便指这一概念群落。“概念图谱”将理论语言学抽象的“概念产生意义”的义理，转化为社会语言学“文化产生差异”的分析机制。作为理论视角，它揭示了语言意义产生的机制，也提供了考察语言变迁的分析框架。霍尔以“概念图谱”的观念强调社会成员间共享的独特概念群落。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概念图谱”截取的概念群落范围可大可小。以大范围而言，不同社会文化概念图谱在物质层面相同或相近，如工具使用，粮食生产等。而在精神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同社会间呈现很大差异。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表征活动依赖于概念系统的存在；社会制度的形成则依赖以文化为

² 概念图谱或称“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

分野的‘概念图谱’的存在。然而，无论是语言或概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历史进程中产生、发展、完善的。任何语言都是历史的，是人类活动的沉淀与结晶。支撑思维活动的概念系统及维系社会生活的概念图谱，使社会成员认知环境，适应环境，从而达到最佳生存状态。以文化分野为根基的概念图谱，其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及变化性，构成了考察语言变迁的学理依据。以此出发，可从晚清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进程“宏大叙事框架外另辟蹊径，避开思维定势，探究社会变迁与语言变迁的内在联系，观察”国民“概念兴衰的历史轨迹及演变逻辑，从另一侧面透视晚清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当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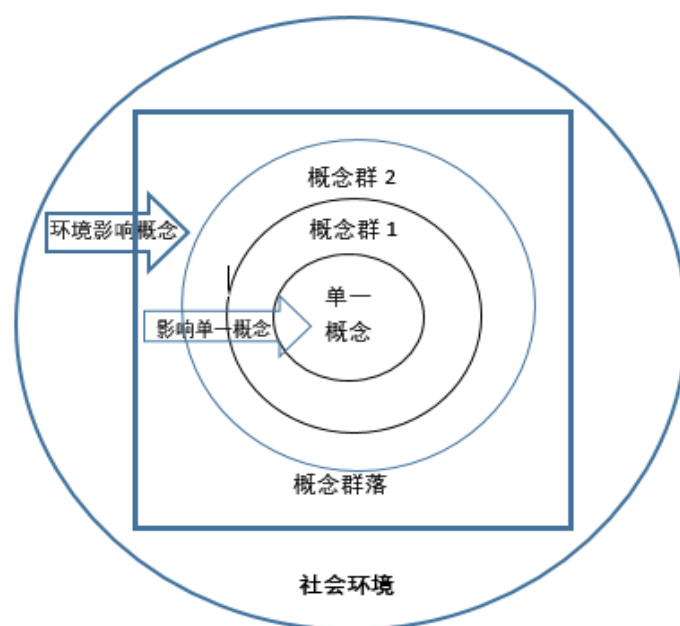


图 1：概念图谱示意

具体而言，晚清“国民“概念可从“语义场“角度考察，因为概念由词语表达，词语由语义构成。语言学家利奇(Leech, 1981: 第二章)将语义分七类，而“概念意义”被单列为独立范畴，称之具有重要“认知意义”(亦如概念图谱等同于认知图谱)。其他六类语义，即外延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反射意义，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则归于第二层级范畴。维斯格伯(Weisgerber)提出词汇意义圈(spheres of meaning)理念，认为词汇的意义通过“意义圈”的历史演变构成语言对思维影响的重要机制(Werner, 1952:252)。“语义场”理论则认定单词只能从其搭配语中展现其具体语义。语义场理论开山学者特雷尔(Trier)通过对古德语与中世纪德语的比较研究，提出语义存在于其邻近词之中的观念，即邻近词构成了某一具体词汇的语义圈，语义圈又可分成不同的层级(semantic sub-areas)，这些不同层级语义圈词义之综合便构成了某一具体词汇的语义。特雷尔将这些语义圈称为“语义场”。“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语义产生于“场”中，而非单一词汇。所谓“场”就

是词与邻词之间的特定关系，所以语义产生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之中，而非词的本身，这便是语义场理论的最大贡献。显然，特雷尔“语义场”与霍尔“概念图谱”在理念与结构上有高度重合之处。两者均强调意义产生于“场域”或“图谱”中，存在于“词与词”、“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与中国传统诗学强调“功夫在诗外”有异曲同工之妙。欲知某词某概念之真义，须跳出该词该概念，顺藤摸瓜，藤是关系，瓜是意义；关系与意义的结合便是语义场。因而语义场可看作是概念图谱的延伸及细化（见图 2），语义场探寻的是微观意义，概念图谱关注的是宏观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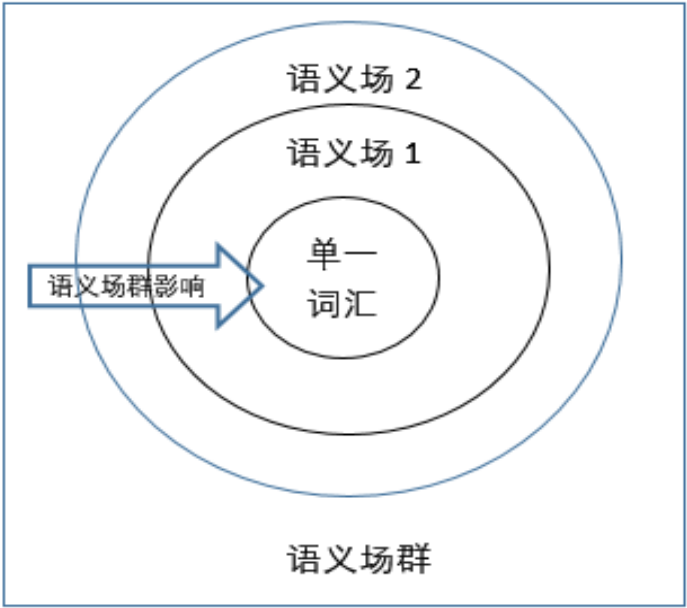


图 2：语义图谱示意

以索绪尔的历时与共时语言学观之，“国民”背后现代国家概念图谱的输入构成语义时空大移植。以历时语义看，“国民”³概念作为民族国家民众身份认同，经数百年积淀，在欧洲家喻户晓，意义已常识化。但“国民”理念移植到东亚的晚清社会，其语义不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国”与“民”观念嫁接，只能在欧陆民族国家概念图谱中发生意义，保持历时语义。以共时语义看，“国民”须与其搭配词互动产生共时语义，而这些搭配词也与中国传统“国”与“民”观念完全割裂，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日语传入晚清的欧陆现代概念话语系统。然而正是在共时语义中，“国民”概念注入了晚清精英使用“国民”概念的强烈用意，那便是“改民建国”，“以民建国”。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涵盖了“公民”（citizen）“的理念，但不等同于“公民”（见下文分析），而是远远超出了“公民”的范畴。晚清“公民”一词出现率极低，意味着“公民”理念并非“国民”概念的主体。《专业数据库》显示在 1830-1930

百年间，“国民”出现 34080 次，而“公民”只有 737 次（见图 3），后者仅占前者 2.16%。

“国民”虽根植欧洲民族国家观，代表现代国家民众身份的转变，但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应词，因其概念虽取自 citizen，语义大大超过该词。“国民”是晚清以欧陆思想为圭臬创造的理念，以重建晚清社会国与民的关系，以“国”统“民”，实现现代社会的身份转换。据其语义”国民“应译成 national people。与“国民”搭配的词组如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国民经济等可译成 national revolution, nat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 economy。此中 national 正是“民族国家”之意。这正应了特雷尔对“语义重组”（semantic regrouping）概念的阐释，语义重组是将同一个词置于不同词群中而产生了新的语义。在特雷尔看来，语义重组将语义历时与共时意义结合起来，因为在语言使用中，语义产生于历时与共时的互动。“国民”一词的创造性及挑战性源于语义的历时与共时双维大幅重组，将欧陆国家观与公民观双重转型浓缩于“国民”一词，赋予其“改民建国”，“以民建国”的纲领。正是通过语义重组，“国民”一词成为晚清迅速流行，极具生命力的新词语。一方面它根植于欧陆现代国家的民众身份转型的历时语义；而另一方面，通过语义重组，它创造性地将“改民建国”，“以民建国”的政治意图植入其共时语义中。由此“国民”一词的概念担当了多重角色。它引入了民族国家观，身份转型观；同时又身兼社会改造及政治动员的功能。在语义重组中，“国民”历时语义起概念图谱的由欧入亚的移植作用，共时语义则起新型国家的建设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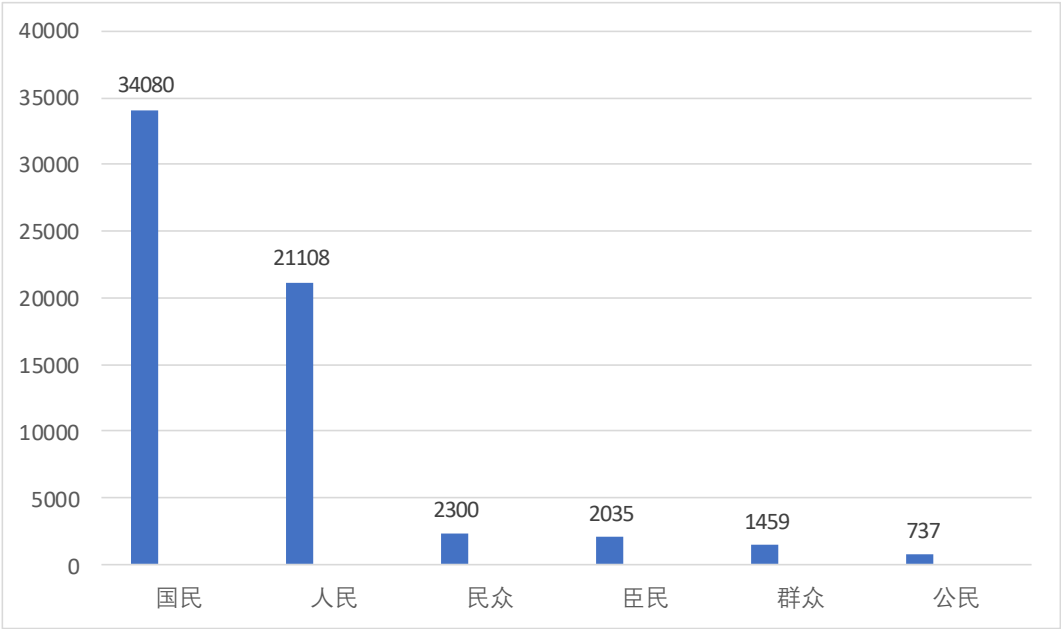


图 3：《专业数据库》人群指称词频

“天下王朝”与“民族国家”：概念图谱跨文明嫁接的语言困境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从古希腊城邦到古罗马共和国；从帝国政体到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理念源于近世西欧，脱胎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现代欧洲世俗国家，从神圣罗马帝国为纽带的基督教统一体，向近代主权国家演进；基督教义统领的传统格局被新型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及规范取代。相互承认、相互独立、力量均衡、主权至上等法则逐步得到认可，欧洲王朝体系渐次过渡到“民族国家”为根基的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引发神圣罗马帝国及基督教统合模式的衰微，整合了欧洲分散的政治行为体，改变了欧洲国家形态。

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与民族国家新范式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由大量新词语所表达、深化、传播并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主权”、“民权”、“领土”、“边境”、“实力均衡”等。每一名词后又有相关概念支撑，形成以该词为统领的概念群。如“公民”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涵盖新的政治关系（法权）、经济关系（市场）、社会关系（个人独立）及文化关系（民族认同）等。这些新型社会实践催生了新语言、新概念，新话语，构成新的民族国家观概念群落的形成。“公民”观念的产生与国家内部现代转型及新型国与国关系的诞生息息相关。一方面，民族国家形态强化了国家内部以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为纽带的民族认同，将松散的民众凝聚成有共同利益与追求的利益共同体，谓之“民族”；而另一方面，一国之内民众身份认同发生转变，忠诚对象由封建领主或国王转向以制度为代表的国家。

由是，民族国家作为新型共同体，促进了外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及内部民众身份与国家制度的转型。内外互动的新型实践促生了两种概念体系的成熟。其一，对外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实践准则，以国际法为规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其二，对内以语言、文化、历史为核心的民族观，及以民权为核心的国家观体系的形成。两种概念体系在晚清，特别是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迅速传入中国。这些概念在晚清社会传播中遭遇了巨大的语言障碍（Cao, 2017），但语言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概念图谱”间存在巨大鸿沟，图谱间重合面过小。欧陆观念在晚清的传播中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表达。语言作为一个符合系统，只能在同一概念图谱中实现其载体的功能；一旦超出了本文文化的概念图谱，词汇便失去了其载体的功能，同时也失去了其传播的功能。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列文森（Levenson, 1968:156-163）⁴认为晚清西学东渐中，语言领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欧洲语言对晚清影响不仅是增添了汉语词汇的丰富性，而是给中国带来了“全新语言”。这并非指中国采用了拉丁字母语言，而是欧洲语言所代表的认知世界方式，取代了汉语言所代表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中国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列文森举例说，自古以来外来语对汉语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但虽与儒学发生摩擦，佛教最终被汉化而消融于中国主流传统之中；因而佛教只为汉语带来了新词汇，而未带来新语言。晚清社会则不然，欧陆观念带来的是全新的概念图谱，不是丰富中国传统概念图谱，而是颠覆而取代它。知识结构的“范式”转移是以“概念图谱”输入的形式实现的，列文森所谓的“新语言”即西方概念图谱产生的一整套新话语，这套新话语为晚清精英所用，企盼将古老中华文明转化成现代国家。因此，“国民”便是欧风美雨吹来的“新语言”，它将意义重大的“国”与“民”连结起来，赋予现代内涵，凝聚改造社会的能量，统御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

“国民” 话语勃兴：“以民建国”

“国民”一词于1903年后呈爆发式涌现，反映出“百日维新”失败后部分精英沉痛反思。制度改良的艰难，使改良派目光由制度转向制度背后的人，不仅是少数权力执掌者，而是芸芸大众。晚清民初“国民”一词使用最多者为梁启超，他极力推行“以民建国”理念。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告白》宣称办刊宗旨是“维新我民”，即改造国民性。改造重点是建“公德”，而非扬“个人”私利。虽倡导个人权利意识，目标是为国家建设铺垫基石，有明显工具主义色彩。改造国民目的明确为“国家主义之教育”，借西洋政治理念“养吾人国家思想”，“以导中国进步”：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开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之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辞费也。本报为中国前途期间，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与一党派。

发刊词毕显梁启超“改民建国”苦心。《新民丛报》之初梁启超连发系列长文《新民说》阐述改民建国的迫切性。《新民说·叙论》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

⁴ 见列文森（Levenson, 1968）最后一章：‘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Conclusion: A New Vocabulary or A New Language）

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虽然《新民丛报》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进行大论战，梁孙对“以民建国”的宗旨完全重合。孙中山（2011：5-6）痛感民众一盘散沙，无民族国家概念，便以“国族主义”诠释“民族主义”，强调“民”之于“国”的重要性。与梁启超强调“民德”不同，孙中山更关注民与民之间纽带的缺失，及民众忠诚范围之狭隘，导致无“国家观”：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对孙中山而言，民族观欠缺源于民众认同范围狭隘，囿于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与宗族。宗族外便无共同利益凝聚民众的忠诚，民与民间便无情感纽带。虽有文化意义的“天下”及高高在上的“朝廷”，两者都无法牵动人们情感，统合利益，勾织共同体。“天下朝廷”政治构架只是士大夫阶层关注的对象，与民众无关，民众的视野与利益从来没有超出血缘为重的熟人社会。“天下”与“朝廷”关系也只由士大夫官僚体系维系。

“国民”一词最早出于先秦典籍，意为封国所辖之民，例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周礼注疏》（春官宗伯第三）中说“令国民族葬”。秦统一中国后，废封建，建郡县，“天下归一”，国的概念随先秦六国消亡而渐淡，被“朝廷”与“天下”取代。“朝廷”承载了“国”的政治组织架构；“国”的疆域观则泛化成“天下”，并由强大中原华夏文化承载，形成文化意义的“天下观”。“天下观”以“华夷之辨”为认知基础，将政治之“国”虚化成文化之“理”。秦后不仅“国”演变成“天下王朝”，先秦国名，燕、楚、齐、韩、赵、魏等也随之消失，由王朝称号取代，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人作为东亚大陆族群，由文化意义的“华夏”观念承载其身份认同。王朝更替只意味着主政皇族的流转，与统合国人身份的华夏意识无关。只在文化意义上“外族”入主中原时，才引发文化

保卫战，如元清时期。进入十九世纪，“国民”语义发生变化，先指外国人（金观涛、刘青峰，2009，309-310），后指一国之民。

《专业数据库》显示，1830 至 1895 的 65 年间“国民”出现频率极低。但于 1895 至 1930 年间迅速增长，出现六次高峰，分别为 1903 年（3906 次），1906 年（1551 次），1913 年（1065 次），1915 年（1601 次），1919 年（687 次）与 1926 年（4307 次）（见图 4）。每次高峰均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前两高峰与梁启超于 1903 年办《新民丛报》倡导改民建国，及 1906 年与《民报》大论战有关。1913 年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及二次革命。而后三次高峰与 1915 新文化运动，1919 五四运动，及 1926 国民革命相关。前两次高峰属“改民建国”舆论宣传，后四次则属“以民建国”政治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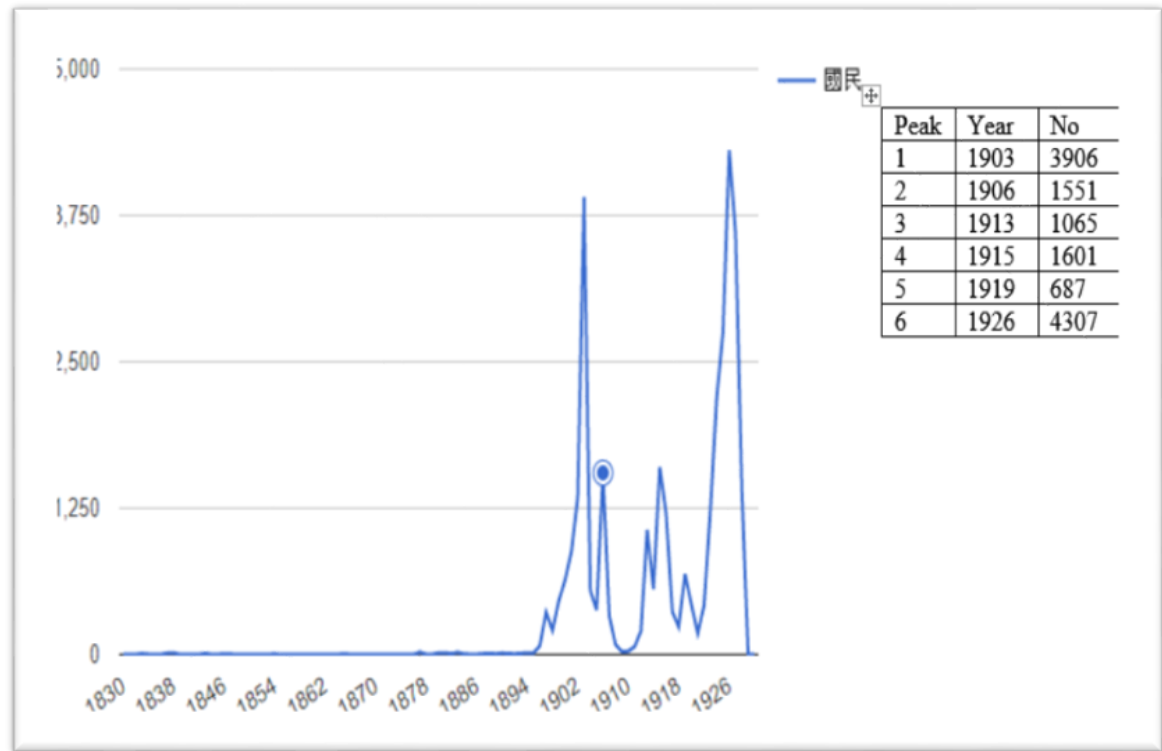


图 4：《专业数据库》“国民”词频

“国民”核心既在“国”，亦在“民”：国者，化天下为国；民者，聚散众为民。“国”与“民”虽是使用了数千年的汉字，进入 20 世纪后内涵全然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支撑“国民”语义的概念图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跨文明移植。概念图谱的变换割断了“国民”的历时语义，成为晚清认知范式转移的一部分。“国民”以民族国家重新定义民与国，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关系，这恰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关键所在。“国”是民族国家之国，“民”是现代国家内全体民众之集合。“国”对外区别于他国而非蛮夷，

对内区别于朝廷与天下；“民”对外区别于他国之民，对内区别于臣民。关于“国民”的全民性，毛泽东（1940）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著名论断，对“国民”统合性及非阶级性提出质疑：“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对晚清精英而言，松散的、以文化立意的天下王朝正是中国无力抵御西方的软肋。西欧近世以来，脱离罗马天主教，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以强悍的民族观念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凝聚起无穷政治能量。一个个新生民族国家如旭日东升，宛如柄柄利刃，在世界范围传统社会中所向披靡。船坚炮利的技术在民族国家统御下发挥无比威力。晚清精英以现代国家建设入手，集结政治能量抗击西方殖民入侵。力图将流沙般个体纳入“国”之容器，凝结成坚固的民族国家，将血缘亲情的“族民”铸成民族认同的“国民”，将一族之私铸成一国之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国民”概念应运而生了。

“国民” 语义解析

“国民”语义剖析采用语料库分析软件 WordSmith Tools 对《大论战语库》进行语义挖掘。利用软件的三个分析功能之一的 Concord（语境排列），以 pattern（分布排列）的亚功能提取“国民”搭配词的分布图。分布排列以列表方式（见表 5），近 24 万字语库测算后，按与“国民”的搭配词词频率及与“国民”一词的空间距离，列出“国民”搭配词量化分布图。此分布图的截取标准是取与“国民”最近的前五个及后五个词，按照这样的设定，通过软件的测算，得出“国民”在大论战语库中的搭配词全图。前五及后五个搭配词，在表 5 中分别以左 1、左 2，左 3，左 4，左 5（L1，L2，L3，L4，L5）及右 1、右 2（R1，R2）等横列标识。表中纵列表示搭配词频的高低。如“国民”前左 1 纵列中，频率最高的词是“共和”，居左 1 纵列之首，左 1 词频排序第二的是“中国”，第三是“民族主义”。位于“国民”之后右纵列之首第五个词也是“共和”。纵列词序中，词频越高的搭配词对“国民”语义的影响越大。横列显示搭配词与“国民”的空间距离，与“国民”越接近对其语义影响越大。搭配词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是距“国民”最近的左 1 及右 1 纵列，占第二重要位置的是左 2 及右 2 纵列，其余类推。分布图以量化方式标识“国民”搭配词群，勾勒出“国民”的具体、量化的语义场。WordSmith Tools 将散布于大量文本中显得无序的概念梳成有序的，以“国民”为中心的量化关系图，准确定位出“国民”背后的隐含的概念群，即“国民”语义赖以生成的微观“概念图谱”。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语料的关系，此处“国民”语义剖析只是一个案例，意义限于晚清《民报》与《新民丛报》大论战语境。由于大论战影响重大，涉及改良与革命的两个现代化路向之间的争议及对现实政治运动的影响，两报对“国民”语义的建构具有代表性意义。

N	L5	L4	L3	L2	L1	Centre	R1	R2	R3	R4	R5
1	国民	国民	可以	今日	共和	国民	主义	资格	利益	国民	共和
2	该报	论者	政府	民族	中国		全体	心理	可以	机关	国民
3	政治	政府	作成	机关	民族主义		心理	能力	作成	政治	机关
4	政府	约法	最高	国民	梭之		多数	国民	必要	共和	政治
5	精神	不能	所谓	政府	所谓		程度	责任	思想	政府	能力
6	论者	革命	机关	以为	对于		对于	国家	国家	关系	最高
7	本报	机关	不能	所谓	一般		思想	民族主义	而已	与否	革命
8	国家	政治	革命	国会	唤醒		自身	不能	政府	民权	不能
9	不能	记者	以为	主权	法国		利益	代表	革命	变迁	纯粹
10	而已	不可不	政策	共和国	以为		革命	责任心	民权	统一	政府
11	中国	民族主义	一面	民权	鼓吹		直接	政治	机关	议院	实现
12	革命	专制	国民	历史	国民		实力	自身	自由	最高	资格
13	能力	中国	主义	其果	称为		资格	国会	普遍	责任	利益
14	主张	可谓	利益	养成	表现		既有	革命	民主	论者	议院
15	改良	心理	中国	原本	全体		论者	共和	不可	观念	与否
16	共和	最高	宪法	将来	现在		总会	实力	不足	而已	发生
17	机关	要求	议会	必须	领土		之一	可以	国民	专制	多数
18	今日	责任	而已	影响	注重		能力	作成	共和	国家	国家
19	宁可	资格	要求	政体	至于		权利	最高	资格	基础	不当
20	将来	第二	精神	能力	虽然		国民	民族	政治	未尝	不能不
21	大部分	民主	第一	领土	说明		议会	其果	共和国	昌明	感情
22	说明	目的	绝对	频频	而已		主权	主权	与否	平等	心理
23	资格	第一	日日	秩序	养成		平等	满州	最高	老辈	自由
24	民族	主义	本报	方面	唤起		约法	感情	统治权	述孙	观念
25	民主	前提	足以	普遍	共和国		集会	顽固	前提	资格	该报
26	民族主义	与否	责任者	波氏	侮辱		进步	投票	主权	分子	本报
27	开明	作成	之际	今世	优于		自有	民权	以来	不知	然则
28	约法	今日	今日	乃应	在于		自治	精神	责任	不能	约法
29	势力	自由	论者	关系	政府		今日	议院	唤醒	革命	人心
30	主义	保皇党	国会	不过	一分		合成	团体	变迁	自由	分子

ance collocates plot patterns clusters timeline filenames source text notes

图 5：《大论战语库》“国民”搭配词前 30 条词链

搭配表中“国民”语义可归纳为四个层面。第一层为国家形态，构成“国民”语义核心。频率最高，距离最近的左 1 纵列之首由“共和”占据，显示“共和”与“国民”关联最为密切。30 条横列中“共和”或“共和国”出现于八列，与“国民”搭配频率与距离双列第一。“共和”是民族国家形式，代表新型治理理念与组织构架。以“共和”为统领，“国民”与国家形态搭配形成一个词语群落，含七重要素。其一为共和政权形式。与“共和”同频搭配词是“国会”、“议会”、“议院”（可看作同义）出现八条横列中。“国会”是现代国家政权形式，“共和”的具体制度安排，“共和”与

“国会”形成现代国家形态的一体两面。其二是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占六横列，包括左1最重要位置。

“民族主义”首现于左1纵列，频率排第三，仅次于“共和”与“中国”。除作为域名的“中国”，“民族主义”量化排序仅亚于“共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出现四次，“民族”三次，表明“民族主义”重于“民族”。正如盖尔纳（Gellner, 2006）所言，民族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理念是民族诞生的助产士。将“民族”与“国家”相连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态最显著标志，也构成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严峻挑战。将“国民”与“民族”观嫁接，意味着晚清精英对“国民”之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功能的双重期待。其三是现代国家组织安排：“政府”与“机关”各出现于七条与六条横列中，两词均指官僚执行机构，不仅说明“国民”与国家建设关系，也反映国家机构安排是民族国家建设自然延伸与细化。

其四为现代国家法制。法制观念包涵“约法”（4次），”民主“与”专制“各两次，”宪法“与“投票”各一次。法制概念中，“约法”最重，出现于右1关键位置一次。“约法”为晚清输入的欧陆契约精神的重要用语，是改良与革命两派均强调的理念。“民主”与“专制”在大论战语境中具特殊涵义。对革命派而言，倡民主必反专制；而改良派则以为，行“开明专制”是迈向民主的必要过渡，认为“国民”意识尚未确立，施行真正民主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开明专制”是最佳选择。当然，梁启超脑中的“开明专制”是波伦哈克式的现代君主，受现代国家体制制约，超然于社会之上，调节社会利益，承载国家统治权，俨然是超脱世俗利害关系的国家主权委托人。然而“开明”是“专制”的前提，“开明”意味着“专制”受“约法”制约。在此逻辑下，“开明专制”被纳入“约法”宽泛意义内。而“宪法”、“民主”与“投票”均为革命派所倡导，成为宪政实施的程序安排。

其五是现代国家外部特征：“领土”在左1显著位置出现，占两横列；”主权“于右1位出现，亦占两横列。“主权”、“领土”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核心观念，构成现代国与国关系的基石，也是传统中国“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轨所必备的理念。外争”国权“，捍卫”领土“的现代国际观也纳入了”国民“的概念图谱。其六为域名，共三个：“中国”（四次）为改造对象，“法国”（一次）为学习对象，“满洲”（一次）为辩论对象。“法国”以左1显著位置与国民搭配，表示“国民”概念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考虑到卢梭之名也出现于左1纵列（见下文），并占第四高频位置，“国民”概念来源首推法国。“满洲”与“国民”相联事关“民族”的定义。在革命派眼中，“种族革命”便是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建立共和，这是同盟会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梁启超心目中的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满族。因而“满族”对“国民”的意义关涉“民族”的内涵及“国民”身份的界定。

其七，搭配表中仅有的两个人名，一是法国的卢梭⁵（1772-1778），出现于左1纵列重要位置。二是德国的波伦哈克⁶（1861-1944），位于左二纵列。两位西欧人成为“国民”搭配词意义重大，不仅表明“国民”样板源于欧陆，更重要的是两人代表了民族国家框架下“主权在民”或“民权主义”与“主权在国”或“国权主义”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卢梭作为启蒙理论家，是反皇权斗士，“主权在民”的旗手；而波伦哈克则相反，是君主主权论者，其《国家论》主张“国家即君主”，视君主为统治权主体，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者。两人与“国民”搭配恰恰显示了“国民”语义内“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的双重倾向及内在张力。

显然，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中，前者推崇“主权在民”，而后者摇摆于两者之间，对“主权在国”的权威情有独钟。梁启超说：“夫既已三权分立矣，则最高主权，非在国民自身而何在也？共和立宪制，其根本精神不可不采卢梭之国民总意说。盖一切立法行政，苟非原本于国民总意，不足为纯粹的共和也”。然而他又话锋一转，认为理论上的主权在民于中国不可行，因中国“民智不开”，“不惯民政”：“若夫在不惯民政而党派分歧、阶级分歧、省界分歧种种方面利害互相冲突之国，则惟有日以此最高主权为投地之骨，群犬狺狺焉竞之，而彼三机关（指三权分立）者，发置如弈棋，吾一日焉得以自安已耳。盖随时拈一问题，可以为竞争之鹄，而国民复无判断是非真厉害之能力，野心家利用而播弄之，略施小伎俩，即可以刺戟其感情，而举国若狂，故所谓多数者，一月之间，恒三盈而三虚，彼恃多数之后援以执政权者，时时皆有朝不保暮之心，人人皆怀五日京兆之想，其复何国利民福之能务也？”

于是梁启超虽然承认主权在民是共和精髓所在，在中国则极危险：“则三权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决非久困专制骤获自由之民所能运用而无弊也，准是以谈，则虽当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之时，幸免于循环反动以取灭亡，而此政体，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或返于共和专制，或返于君主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于是梁启超从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民权主义迅速转移到波伦哈克的国权主义观。这亦表明“国民”语义存在宽泛空间，内涵并非统一稳定，涵盖了大动荡时代精英的思考与探索。国家主义作为晚清意识形态主流是支撑“国民”语义核心概念，正如《民报》所言“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诂于国家主义之下”，“国民主义”作为大论战重要词语（出现57次）必然在国家主义语境下产生意义。以上是“国民”概念第一层语义的七重因素，

⁵ 搭配表中出现的是“梭之”，“梭”指卢梭，这是分词软件不能分辨卢梭所致。

⁶ 搭配表中出现的是“波氏”，指波伦哈克。



图 6: 《大论战语库》“国民”云图

第二层语义关涉“国民”个性特征，侧重于“国民”素质。搭配词包括“资格”（六次）、“能力”（5次）、“心理”（4次）、“感情”（2次）。“资格”高频出现表明对传统“族民”与“臣民”现状不满。“资格”概念的实质是“国民”标准问题，而标准取自欧陆移植过来的工业文明，要求民众具备现代“能力”，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能力”内涵显然不同。晚清精英以工业文明标准衡量农业社会民众，对国民性批评就不足为奇了。细观语料文本，对“资格”谈论最多的梁启超，他哀叹国人素质低下，不具备担当现代国民的资格：“今日中国国民未有能力为共和国民资格”，主张“开明专制”“过渡，以时间换国民品格的培养。”国民“资格亦是两报辩论焦点，改良派认为民众”顽劣“无”资格“建共和，革命派认为政府”顽劣“，国民有资格建共和。与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对”国民“资格评判暧昧，政治上认可，文化上恨铁不成钢。如果说工业文明个人”能力“可具体化为政治能力（权利与妥协）、经济能力（技能与效率）、社会能力（沟通与守则）等尚可训练的技能，那么”心理“则涉及深层心灵领域，难以细化。

对心理讨论最多的是《新民丛报》，企望民众脱胎换骨：“改良进化者，不可不取国民心理洗涤而更新之。然欲洗涤更新国民之心理，必非口舌煽动笔墨鼓吹所能为力，而必赖秩序之教育。”何谓“心理”？《民报》以为“凡国民心理，必须其为自由发动者”，自由即为自愿。有了愿景则心诚则灵：“国民心理而能如是者，则共和不期成而自成美国也，或且无共和之名，而有其实”。“心理”涵义最终与“共和”相连，被纳入政治格局。因此，“心理”是工具化的心理，心灵是政治化的心灵。在这个语境下，“感情”同“心理”一样将“国民”理性层面的硬素质转向感性层面的软素质。所以梁启超认为改

造心理之功笔墨鼓吹不够，需借教育之力。据此“国民”个性特征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了。

第三层语义为价值观。涉及面较广，搭配词包括“自由”（四次）、“民权”（3次）、“平等”（二次）及“权利”、“自治”、“进步”、“集会”（各一次）。与第一、第二层面语义相比，第三层价值观搭配语词频偏低。无疑，价值观搭配词语与欧陆启蒙主义概念图谱直接相连，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理念。大论战语料中，与“自由”搭配最频者是“平等”与“博爱”，三词相连出现18次，为“自由”词链（cluster）之首，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口号。与“自由”相连则为“意志”与“精神”，可见此处“国民”自由“观突显个人，弘扬”民“作为个体的自主精神，其意义源于法兰西”人生而自由“的天赋人权说，较少工具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国民“与“公民”高度重合。因而“国民”常被译成Citizen。这不仅是望文生义的错误，而反映了“国民”语义的多重复合性。“国民”与“臣民”相比，则为“公民”，与“族民”相对便是“国民”（national people）。

“国民”语义重“国”轻“民”反映了晚清对救亡图存轻重缓急的排序。以民建国首要任务是去“一己之私”立“一国之公”，举全民之力建新型之国，将可见的“族民”改造成安德森（Anderson, 1983）所说“想象的共同体”中互不谋面的“国民”。“国民”重铸与扩大利益共同体，以民力鼎撑现代国家，取代朝廷承载天下的旧制度。与建国相比，增进个体利益的自由、民权、平等、自治等居次要地位。第四层语义为革命。”革命“出现于八条横列中，并占右1、右2重要位置，显示革命与国民关联密切。作为大论战争论焦点，革命与否涉及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式，涉及对”国民“品格、素质及能力的判断。在第二层语义中，对”国民“资格的判定确立了两派的分野与立场，导致了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路向。严格说来，双方分歧源于对”国民“资质的理解，对改良派而言”国民“是救亡图存问题的根源，对革命派而言”旧制度“是问题根源。虽然革命派在大论战获胜，改良派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远未完结，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知识精英承担的时代使命。

结语

本文以晚清“国民”概念多重历史语义复合为例，探讨中国本土实践与西方外来价值之间出现鸿沟状况下，政治文化精通过开创型语言建构，为实现民族国家建设所进行的艰辛努力。本文认为，晚清“国民”概念有三层重要意义。其一，“国民”概念的产生、建构与传播是中国从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过渡历史巨变中，思想观念准备的核心环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语言范式转向的经典范例。其二，具体而言，“国民”的核心功能在于厘清与奠定现代社会“国”与“民”之间的新关系。在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中，在甲午战败，危机日重，举国焦虑国情中，“国民”话语建“国”是目标，改“民”为路径；

“国”与“民”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所建的是传统社会之“民”与新型政治之“国”的纽带关系。由于这一原因，一旦民众对现代国家有了常识性认知与参与，“国民”话语便完成了概念意义上国家建设的语言使命，作为历史名词淡出视野，渐渐退出了日常语。

其三，正是由于“国”与“民”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民”所强调的是对国家的义务，对民族的认同与忠诚；而非一些晚清研究中所强调的个人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及自由意识。虽然这些意识均存在于晚清“国民”话语中，它们居于次要地位。质言之，“国民”话语所建构的是“国”，是“民族国家”意识；而非“民”的主体意识。对“民”而言，他们首要做的是“脱家入国”、“脱族入国”，即梁启超所言，从“族民”或“部民”身份向“国民”身份转换。这是忠诚对象的转换，而非权力关系的转换，是严复所说“群”之扩大，即从乡土族亲的小共同体“熟人社会”，向民族国家大共同体的“生人社会”转换，从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向以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为根基的政治共同体的转换。

因而，晚清“国民”强调更多的是波伦哈克式的“国权”，而非卢梭式的“民权”。这也完全符合晚清精英建设现代国家，富国强兵的主流诉求。“国民”概念的兴衰反映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复杂进程，表明语言是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间互动不可或缺的载体，是社会变迁赖以实现的思维机制及意识形态工具。在这个历史语境中透视晚清“国民”的语义构成及意义，或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态转型遭遇的困境，及当代国人政治身份构成的历史轨迹。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

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001.htm>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孙中山（2011）《三民主义》，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英文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Cao, Qing (2017) Rupture in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Radicalism in Late Qing Chinese Press Debate',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31(6), 9-28

Gellner, Ernest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n,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Hall, Stuart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eech, Geoffrey (1981)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ition)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Levenson, Joseph R.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rner, Heinz (1952)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by Stephen Ullmann, *Language*, 28(2), 249-256